

李敖作品精选 第2辑

● 李敖 著

西餐叉子吃人肉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敖作品精选第2辑

● 李敖 著

西餐叉子 吃人肉

中国华侨出版社

Gay/43/04

(京) 新登字 190 号

李敖作品精选第2辑
西餐叉子吃人肉
〔台湾〕李敖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150 千字 9 印张
版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7-80074-506-6/1·282
定 价 (全四辑):23.20 元
本 辑:5.80 元

目 录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1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8
西餐叉子吃人肉	44
“显性伪君子”和“隐性伪君子”	48
惨刑与迫害	52
祖法和历法	70
莎士比亚是特务	74
怎样教洋鬼子	77
中华大赌特赌史	82
师道与是非	94
捺钵文化和比较.....	107
旧天子与新皇帝.....	111
宋帝始生异象考.....	119
“两昆仑”考	126
论袁世凯（二篇）	131
避祸学大纲.....	137
乱世父女泪.....	141

•••••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做浅盏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

•••••

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text{知识分子+威权者} = \begin{cases} \text{成则为王} \\ \text{败则为寇} \end{cases}$$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这一病态的原因，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尝试所得，原因可有五点：

一、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

•••••

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二、急于用世

上面的谋生问题，有些知识分子幸能解决，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怀才不遇”“不甘寂寞”的问题。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

•••••

“磨”一般的自毀，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三、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昧“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Chauvinist）和家族的忠仆！

豪，这次竟被我透视了一下子，想来也许不服。不过晓波的不服一点不值得担忧，三杯老米酒一下肚，他就软化了。千言万语摆不平他，三杯黄汤就可叫他肝脑涂地。可见制什么知识分子，实在也无须什么知识。

一九七〇、五、十，夜五时

（附记）

这是我代丁颖为王晓波《象牙塔外》写的序。
《象牙塔外》一九七〇年七月由丁颖的蓝灯出版社出版。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谰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

~~~~~





## 2.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十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十二）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

